

论江汉平原地区刺绣文化的发展变迁

文 / 郑高杰,叶洪光

摘要:从文化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历史学方法,论证了江汉平原地区刺绣发展变迁的轨迹,即蚕桑创始(萌生)、走向辉煌(发展与兴盛)、千年回转(式微与转机)、走向未来(调整)。并进一步从文化学角度分析,认为文化发展变迁过程中,楚绣和汉绣作为不同时代同一地域的代表品种,有着必然的文化遗产关系,从而梳理并丰富了江汉平原地区的丝绸文化研究。有助于古为今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与理论支持。

关键词:江汉平原;丝绸文化;楚绣;汉绣

江汉平原的刺绣遗存主要有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静态的文物遗存,以收藏于荆州博物馆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织绣实物为代表,为中国刺绣历史上不可超越的珍贵资料,奠定了刺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技艺或者物品的历史根据;另一种是活态的技艺传统,物品形式表现为绣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广泛流传于武汉、洪湖、荆州(荆沙)及周边地区,并服务于社会生活。因此,对于江汉平原的刺绣历史也只能结合历史遗存和文化发展一般规律对其进行谨慎归纳。从目前的各种资料出发,可以将其大致的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 蚕桑创始——萌生

“对刺绣历史的考察,离不开对丝织起源的考察。”^[1]对江汉平原刺绣历史起源的考察自然就离不开对古代楚人的丝织起源的考察。

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懂得利用天然蛋白纤维,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蚕丝的利用。蚕丝纤维细软光滑,其特性使其成为了很

好的纺织原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丝绸文明和蚕神崇拜。

古代人们对于蚕十分重视,奉蚕为神。在卜辞有“蚕示三牢”的记载,说明祭蚕神要用三牢表示仪式的隆重。另有丝绸历史研究专家薛宗正教授认为,从甲骨文等考古学资料可以推测证实,龙的来源是蚕。由此可见,在中华民族对龙崇拜之前应该还有着对蚕神崇拜的历史,以及蚕在远古时代对人类的重要影响和突出贡献。“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关于丝织起源的内容,有‘伏羲化蚕’说,有‘西陵氏之女嫫祖始教民育蚕’说等。传说中的嫫祖是西陵氏之女,她在西陵时已会养蚕,嫁给黄帝后教民育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夏郡辖十四县,首曰西陵,位于洞庭江汉一带。以上说明,江汉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有可能是养蚕的起源地之一。”^[2]养蚕缫丝的出现,为该地区刺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样的条件使得古代刺绣的产生在江汉平原有了可能。之后春秋战国时期楚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中部地区刺绣比较与研究——以鄂豫代表绣种为例》(2010b173);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湘鄂西部土家织锦的传承与产业开发》(11YJA760089)

作者简介:郑高杰,闽南理工学院服装与艺术设计系教师;叶洪光,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

墓的织绣历史发现,显示出织绣技艺发展的成熟,可以反证江汉平原的刺绣应该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已有产生。

因此,从新石器时代桑蚕产生至西周时期楚国发展兴盛以前的历史,可以认为是江汉平原地区刺绣文化的萌生期。

2 走向辉煌——发展与兴盛

西周时期,随着楚地的社会发展,该地区的刺绣也获得很快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刺绣影响远至西伯利亚等地区,结合国内外考古资料研究,可以断定江汉地区的刺绣首次走向辉煌,经历了发展与兴盛。在中国刺绣发展变迁的历史上,率先走向了辉煌,而且有丰富的保留至今的考古资料。

“到周成王时候,楚之先祖熊绎被封于楚蛮,当时楚与周的关系可能还比较融洽,但到周夷王时,因周王室衰微,诸侯或不朝,楚也毫无疑问与周脱离了关系,在江汉一带发展起来。”^[3]楚的发展,丰富了该地区的各种文明,古代楚人的纺织丝绸文明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彭浩先生对于考古发现描述到:“在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了一大批保存较好的绣品,华丽的纹样,大胆的构思设计,绣工的精美,令人倾倒。”^[4]袁朝先生对于楚墓出土刺绣给予评价:“1981年元月,考古工作者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丝织品。”^[5]张正明先生的评价更高,称“品种之繁多,工艺之精湛,保存之完整,都是前所未见的,此墓的发掘,对丝织史和刺绣史来说,都有划时代的意义。”^[6]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C. И. 鲁金科博士描述到:“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素底间的形像是极其多样化的……按照织物上的花纹,它的富于表现力的形像和优美的色调,无疑的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品。”^[7]

荆州地区战国楚墓出土的织绣品数量多,保存完整,技艺精湛,风格图案美妙浪漫,向世人展示了古代刺绣艺术的精美绝伦,在相关文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又因其历史最久远、遗存最丰富,而成为中国织绣领域30年来不可超越的发现。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阶段从奴隶社会晚期过渡至封建社会初期,可以认为是江汉丝织刺绣文化首次走向辉煌的过程,是从发展走向兴盛的历史时期。

3 千年回转——式微与转机

春秋战国之后,历史车轮转向封建社会,秦汉时代到来。秦暴政统治,在历史上并未留存有影响的丝织品。直到汉代,生产恢复,经济有了显著发展,手工业方面经历西汉初期的恢复,到了西汉中期和东汉前期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繁荣。汉代以前的刺绣主要是辫绣,有着明确的装饰实用功能。“《尚书·禹贡》:‘荆州产玄纁玁组’,说明楚国的荆州长沙地区,是丝带的传统产地。”^[8]当时的刺绣主要是丝织品的装饰,可以推测当时刺绣也很盛行。关于汉代的刺绣遗存,最有代表性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在历史文化范围上同属楚文化,在地域范围上同江汉平原毗连。另传说东汉三国时期,刘备迎娶孙夫人返荆州至岐山,诸葛亮令人“挂锦在山,结绣如林”为其庆贺,此后岐山易名绣林山,后又更名为“绣林镇”(原为石首县绣林镇,1986年石首市撤县设市,改为绣林街道)。从地名侧面考证了当时的丝织刺绣情况。

到了唐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重新突显,文化艺术服务于社会需求,该地区的刺绣文明也获得发展。唐代的资料已经比较丰富,宋代开封地区因其特殊的地位引领着刺绣的发展,迎来中国刺绣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兴盛,这时候江汉平原的刺绣史料则比较罕见,推断可能走向了式微。唐代

刺绣传承着实用装饰功能,一般仍作为服饰品的装饰,此外开始绣作佛经或佛像,服务宗教。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杜甫诗“宿晋长斋绣佛前”,无不反映当时的刺绣面貌。到了宋代,刺绣作为服饰品的装饰,尤其得到皇室的喜爱,在北宋都城开封,专门设立了“文绣苑”,开封城内刺绣交易也比较普遍,均有史料记载。另一方面,宋代刺绣开始向书画方向发展,产生了宋代闺阁绣,具有绣画的特点,从故宫博物院藏品及出版资料可以考察这一事实。可以推测,唐宋时中原地区刺绣发展引领了中国刺绣历史,江汉平原地区的刺绣相对走向式微。

明清民国时期,中国刺绣获得空前大发展,江汉刺绣重新登上刺绣舞台。随着历史迁徙和商品经济发展等社会因素影响,江南地区的刺绣首先获得发展。明代上海“露香园”顾氏的刺绣因其艺术成就卓著而率先成为地方性刺绣体系——顾绣。之后,受顾绣影响,苏州、成都、长沙、广东(广州和潮州)地区的刺绣结合本地区文化特色都获得发展,根据社会影响和艺术风貌,逐渐形成“四大名绣”刺绣体系。

江汉平原的刺绣逐渐发展成为汉绣体系,主要分布于武汉、洪湖、荆州(荆州和沙市)等地区。清嘉庆年间,江夏和夏口地区,以汉绣、戏衣等生产聚集而初具刺绣行业规模。“咸丰年间,汉口织绣局集中省内各地民间绣工绣制官服、装饰品,1851年辛亥年间,任选卿最早在武昌专营戏剧行头。”^[9]武昌青龙巷吴文源绣庄主人吴文绣,以能画善绣,掌握全套汉绣制作精湛技艺,在行业内享有名气,他被聘为汉口织绣局高级技师。1860年武昌汉绣业因批零兼营各类绣品,承接定货业务量极大,在武昌塘角开辟发外加工的第一个刺绣加工基地。近代汉口织绣局和汉口绣花街生产种类丰富,面向不同层次需求的绣品,适应了官员、士绅、商

人、伶人、普通百姓等的需求,展示了江汉平原地区刺绣的发展。1910年汉口美粹学社、彩霞公司的绣字、绣画皆荣膺南洋赛会一等金牌奖;在1915年被选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并再次获金奖。经过这段历史时期的转折发展,江汉地区的刺绣形成了汉绣体系。之后的国内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萧条,中国刺绣发展步入低谷,汉绣在经历历史转机后,再次步入低谷,1943年代汉口绣花街毁于战乱,给汉绣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从秦汉以后至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地区的刺绣经历式微与转机的变迁发展轨迹。一方面形成了近代汉绣体系,取得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因其社会功能和艺术风貌的局限,没有发扬历史初创期的卓越辉煌,以致最终位列四大名绣之外。

4 走向未来——调整

1949年以后,国家环境发生变化,各方面要积极开展生产,进入到社会经济恢复重建阶段,手工业在整个社会环境下也得到发展。“传统工艺经过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抛弃了小作坊和纯手工生产方式,完成了向规模企业、手工与机器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工艺生产体系的建立。”^[10]

在武汉,政府将汉绣艺人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以后又同戏装合并开展生产。1951年,汉绣行业开始组合成合作社,张义顺、郑复昌、黄开茂等组织为第一刺绣生产联营社;邵庆昌、胡椿茂、戴美昌等组织为第二刺绣生产联营社;胡源利、涂添盛、邵源茂等组织为第三刺绣生产联营社。1955年,根据全国生产合作化的精神,三个刺绣联营社合并为武汉市第一工艺刺绣生产合作社。之后,武汉市第一工艺刺绣生产合作社与武汉市戏剧用品生产合作社,武汉市手工业管理局湘绣训练班合并为武汉市民艺戏剧绣品合作工厂,开始由生产低档戏

衣, 转而为专业剧团、著名演员定制戏曲服饰与道具, 并将画绣成立一个专业车间, 同时恢复武昌白沙洲、积玉桥外加工基地。1959年, 由湖北省轻工业局工艺美术处陈敬祥等人设计, 戴美萱、胡荣庭、何秀英、张大秀、黄圣辉、张丽君、张惠芬等20余人合力绣制二米见方的大型壁挂绣品“三棒鼓舞”、“闹莲湘”选送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陈列。196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 汉绣作为反四旧的对象, 许多珍贵资料被烧毁, 受到严重破坏。

在洪湖, 湖北省工艺美术处在吴家绣花铺基础上设立“汉绣研究室”, 研究室以吴寿康、吴永芳主持设计与制作的日常工作, 先后绣制有《奔马》、《天女散花》、《穆桂英挂帅》、《木兰从军》、《洪湖赤卫队》、《听琴》等欣赏性作品, 成为汉绣的精品。

1978年后至1980年代末期, 武汉、洪湖、沙市三地并驾齐驱, 汉绣产品发展到帐帘、披风、被面、枕套、服装、大幅、中堂、条屏、折页、摇件和屏风等十多个品种, 绣品种类丰富, 汉绣得到短暂发展。“进入80年代末期以后, 工艺企业的繁荣没有得到延续, 多数企业负债累累, 举步维艰。……这才才有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拆大化小’、‘变公为私’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1]1989年洪湖汉绣吴寿康先生病退, 1991年武汉旧城改造, 汉口“绣花街”随之消失, 沙市绣品厂也在这个时期倒闭。在全国“拆大化小”、“变公为私”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 湖北汉绣并没有成功的实现转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汉绣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步伐上的缓慢。

2003年国家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2005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到2006年国务

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这段时期汉绣行业重新进行调整, 武汉和洪湖积极申报汉绣国家级保护名录。在2008年, 武汉汉绣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 通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与关注, 汉绣发展初见端倪, 已恢复武汉、荆州、洪湖、大冶等地生产。在江汉平原地区, 重新形成自己的体系, 并且汉绣行业在逐渐的完善, 一方面挖掘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创新传统文化。回顾1949年以来, 汉绣经历着曲折变迁, 站在历史角度整体来看, 可以认为汉绣正在走向未来的调整期。

参考文献:

- [1]叶继红. 传统技艺与文化再生: 对苏州镇湖绣女及刺绣活动的社会学考察[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4: 33.
- [2]彭浩. 楚人的纺织与服饰[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2-3.
- [3]胡克森. 融合: 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72.
- [4]彭浩. 楚人的纺织与服饰[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87.
- [5]袁朝.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刺绣品图案考释[J]. 中原文物. 1993(01): 47.
- [6]张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61.
- [7](苏)C. И. 鲁金科. 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J]. 考古学报. 1957: 37-39.
- [8]田自秉. 中国工艺美术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4: 149.
- [9]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 武汉手工业精英集[C]. 手工业合作联社编制办公室, 1984: 33.
- [10][11]邱春林. 从一元到多元: 传统工艺进入现代生产的途径[J]. 美术观察, 2010: 16.

(收稿日期: 2012年11月22日)